

近代皖江区域金融市场紊乱与经济波动^{*1}

方前移

(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在近代中国,各种官私机构滥发、兑汇各种货币、票据,追逐套利,造成金融市场紊乱、加剧民生困苦,皖江区域自不例外。皖江区域作为全国重要稻米输出以及工业品输入市场,波动频繁本身是其经济显著特征,在紊乱的金融市场作用下,两者更是相互推波助澜。因而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稳定金融市场、平复经济波动,来维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府正是造成这种紊乱和波动的最重要主体。

【关键词】:金融市场;经济波动;皖江区域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7)04-0500-08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西方近代化理论范式的引入,国内学界逐渐将中国近代化历程置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重要位置。至于涉及到皖省区域经济史的相关研究成果,^②也体现这种趋向。但是由于近代化概念过于综合和难以计量,使得我们仍然停留于定性认识;实际上在经济近代化的宏观趋势中,依然蕴含着具体的经济波动轨迹。笔者在阅读旧海关资料时,发现其中文字和数据资料的记录,可以证实与其他区域经济相比,皖江区域经济存在着更显著的波动特征。而在造成经济波动的众多影响因素之中,金融市场起着媒介、积累、调节、传导等多重作用,同时目前学界对皖江区域金融市场也几乎没有相关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两者之间关系,以增加对皖江区域经济近代化的具体认识。

一、芜湖金融市场紊乱的表现

近代中国长期实行银、钱双本位制。20世纪以前,小额交易使用制钱,大额贸易使用白银。各地制钱成分、重量变动不一,白银成色、平砵千差万别。就皖省而言,1897年安徽银元局设立之前,货币完全依赖外埠输入,自是无法摆脱混乱局面。以皖省唯一约开口岸——芜湖为例,因向官府缴纳厘金而得名的“绳厘”,1串是由1000枚(文)尺寸大、质量好的制钱串接而成,但在商业流通中,1串钱一般只有974枚,而且尺寸、良劣比例构成多种多样。例如,“西典”串钱,虽然都为良币,但尺寸不

¹*收稿日期:2017-01-18;修回日期:2017-05-30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6A0104);安徽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人才国(境)外访学研修重点项目(gxfxZD2016112)

作者简介:方前移(1976-),男,安徽无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²①如翁飞《安徽近代经济史》,黄山书社1989年版;王鹤明、施立业《安徽近代经济轨迹》,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朱庆葆《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代化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周忍伟《举步维艰——皖江城市近代化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张仲礼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章征科《从旧埠到新城——20世纪芜湖城市经济发展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沈世培《文明的撞击与困惑——近代江淮地区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一；“毛钱”串钱，所含制钱良劣不等，有“1-9”至“7-3”钱的不同区别，分别含有1/10至7/10不同比例的劣币。^{[1]第152册，246-247}这种串钱组合的混乱，导致民间私铸、私销盛行，劣币驱逐良币。钱商先将“绳厘”串钱私销成铜，然后可以私铸出6000-10000枚成色、尺寸不等的劣币，混合在良币中使用^{[1]第24册，235}，即可获得高利，从而使制钱流通乱象频发。同时制钱原以滇铜作为币材，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滇铜的运输路线中断；战后清廷努力恢复交通，但是滇铜产量再也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铜价上升。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省制钱私销更趋盛行。如在芜湖，钱商将“绳厘”串钱销毁，可得精铜七斤，按每斤三、四百文最低估算，盈利至少在一倍之上。为了维护市场上的制钱流通量，1896年1月4日起，芜湖海关禁止制钱直接出口，同时将每名旅客携带的制钱数量，规定从3万文一降降到1万文，^{[1]第24册，236}但是仍然无法遏制制钱减少的事实，一些商店开始使用小竹片作为小额交易结账凭据，用来代替制钱。^{[1]第155册，382}

为了缓解钱荒，安庆造币厂于1902年开始铸造铜元。与制钱相比，铜元面值较大，因而可以获取丰厚的铸造余利。在其他各省，也存在同样的情况。铜元铸造由缓解钱荒的目的，逐渐衍变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由禁止出省转变为大肆鼓励铜元外销。几乎所有以他省造币厂命名的铜元，都在芜湖流通；显然，不同地方的兑换率投机，是对这种现象最好的解释，反之亦然。^{[1]第155册，383}1907年，清廷为了加强对地方铜元铸造权的控制，将安庆造币厂裁并入江宁造币厂为止，皖省共铸造“当十”铜元5.19亿枚。^[2]芜湖市场上铜元由坚挺走向大幅贬值，“当十”铜元与墨西哥银元的兑换率，从1905年的95枚兑换1元贬值到1910年的137.7枚。

北洋政府期间，铸造余利继续成为地方筹集财政的重要方式。1919年12月，安徽造币厂重新开业，至1927年6月关闭时，再次铸造“当十”铜元8.73亿枚、“当二十”铜元4.48万枚，^{[3]190}加上省外涌入，铜元泛滥，价格跌落。1921年12月，“当十”铜元贬值到157枚兑换1元，为1912-1921年十年期间最低价格。^{[1]第156册，346}1922-1931年，铜元极度贬值仍是皖省金融最引人注目特点，1930年芜湖市场318枚“当十”铜元兑换1元。^{[1]第158册，756}

与小额贸易用制钱、铜元相比，近代大额交易一般用银。银有两、元之分，银两又有千差万别，计值重量不仅不同地方相异，而且同一地方也不相同。如芜湖的1两关平银重583.3英厘，1两漕平银重565.6英厘；1两库平银，在店与店之间，甚至在同一商店或钱庄接受和给出之间，更有564.7、569.1、573、575、575.9、580、580.8和583.3英厘的区别。此外银两成色、纯度也无法统一，芜湖市场上银两有“2-9”成色（100两含有2钱合金，即998纯度）直至“2-3”成色（100两中含有14钱合金，即986纯度）不等区别，漕平银普遍使用“2-7”成色，关平银通常使用“2-5”成色。在货值结算中，重量、成色需要繁琐折算。例如，关税必须以100%纯度关平银作为计算单位，假如用“2-7”漕平银支付100两关税，实际要支付103.77两漕平银；假如用“2-5”漕平银缴纳，实际要支付104.17两漕平银。此外，海关银号在营业习惯上，通常将“2-7”银作为“2-5”银接受，税负者更是承受了额外损耗，^{[1]第152册，246}除此之外，还有名称繁杂的省外银两的流通。这些银两在流通中重量、成色的折算，增加了贸易交易成本。

直到20世纪以后，随着外国和本国银元大量流入和铸造，伴随着不同的时滞效应，银两才从芜湖、安庆等城市和内地市场相继退出。据笔者对芜湖海关历年金银进出口记录表分析，民国以后，银两已基本上从进出口记录中消失，银元取而代之，开始成为大额贸易最主要的实体货币；^{①③}因为银元与银两相比，计值方便。

中国最早流通的银元是西班牙银元，因为重量、形状、质量规整，早在乾嘉时期，已经成为最受欢迎货币。^{[4]38}1821年，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独立，停止铸造西班牙银元，导致中国沿海通用市场货币紧缩。为了缓解金融，金融中心上海于1855年通告各种银币只需成色、重量一致，一律通用。1856年后，上海外国洋行开始以墨西哥银元作为记账单位，墨西哥银元逐渐成为在华主要外国货币。

但在近代皖省，外国银元流通却呈现出与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的趋势，墨西哥银元始终没有占据主要地位。从1877年芜湖

³ ①笔者根据芜湖海关历年报告数据表中芜湖海关历年货币种类进出口数量统计，得出这一结论。

开埠以后，墨西哥元仅被“五洋”商店接受，流通并不普遍，西班牙银元却在皖省长期盛行，信用最坚，价格最高，^{[5]103}成为最主要结算银币。例如自1882年清廷将镇江米市迁往芜湖，粮食贸易逐渐成为芜湖海关的最主要商品贸易，1886年，虽然芜湖海关规定，稻米出口以银两代替西班牙银元，用来结账，但是粮食耕种者、贸易中间商习惯于这种货币，拒绝接受其他银元或者银两。西班牙银元继续升值，被大量窖藏起来。1882-1891年间，皖省仅有100万枚西班牙银元流通于市场，供不应求，导致银元价格从1882年0.75海关两升水至1891年0.85海关两。^{[1]第152册，246}为了遏制这种现象，1897年皖省官方公告西班牙银元与墨西哥银元等值交换，但是得不到贯彻。^{[1]第153册，387}1898年，皖省银元局设立，开始铸造本省银元，官府宣布三种银元等价使用，但是民众对于西班牙银元的消费偏好，使得本省银元很难在皖省内地流通，市场兑换率也只有0.8墨西哥元。西班牙银元也是钱商最主要的囤积居奇对象，例如1898年芜湖两家最大钱庄，利用官府禁止粮食出境、西班牙银元跌价的时机，囤积37万枚西班牙银元，市场只有3万枚在他们囤积之外；迫到禁令废除，对西班牙银元需求飙升，钱庄主大肆抬高价格，投机获利。^{[1]第27册，243}芜湖海关十年报告统计也指出，1892-1901年间，西班牙银元继续升值，平均价格升至1元兑换1.32墨西哥元。^{[1]第155册，387}

1902-1911年间，皖省金融运行最显著特征仍是西班牙银元价格坚挺。每到稻米登场季节，价格更趋上涨，赋予它以相当完美的虚构价值。例如，1902年秋收季节，价格升至1.5墨西哥元；而本省银元价格持续下降，每元兑换率从950文跌落到825文。^{[1]第35册，289-290}皖省市场西班牙银元价格坚挺，导致西班牙银元涌向皖省集中，追逐套利。据统计，1902-1911年，皖省共有400万元西班牙银元，其中市场上流通200万元，另200万元被窖藏。西班牙银元甚至成为皖省某些地区征税的结算货币，但是由于西班牙银元早已停止铸造，自然无法增加供应；加以芜湖海关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提高，西班牙银元不能满足需求，从而阻碍贸易开展。^{[1]第155册，381}因此，随着本国银元替代效应的发挥，西班牙银元逐渐退出皖省市场。1913年以后，西班牙银元已基本上从芜湖海关进出口货币中消失，退出流通，仅在内地庐州、六安等地，因习久易识，乡村尚有存者。^④

外国银元普遍流通最终刺激本国银元的铸造。1887年张之洞在广东省仿铸洋元，开创中国银元铸造之先，随后各省纷纷仿铸。皖省也于1897年3月由巡抚邓华熙上奏朝廷，言皖省制钱缺乏，请仿广东、湖北，铸大小银元，以济钱荒，而挽外溢之利。^{[6]1-2}次年3月，皖省设立银元局开炉铸造银币。但是皖省银元成色低劣，在各地市场不受欢迎，如在南京市面，安徽银元兑换率短少钱120文；松江市面，钱商对安徽银元诸多挑剔，几至一文不值；杭州市面，安徽银元滞销；在本省芜湖行用，也因成色不足，被迫贬值。^[7]1899年5月，为了整顿各省滥发现象，清廷规范银元铸造市场，关闭安徽银元局。安徽银元局在存在期间，共铸造500万元左右。1913年7月后，倪嗣冲掌皖，为了解决财政来源，1914、1919年安庆造币厂两次恢复，至1920年又共铸各种银币130万元。^[8]同时各省银币流通皖省，1912-1921年，最受欢迎是孙币和袁币，以及重庆、湖北和本省银元；墨西哥和西班牙银元已被本国银元替代，退出流通。^{[1]第156册，345}

除了以上各种形式铸币以外，市面流通不同类型的票据、纸币。道光年间，清廷要求各省调查钱票流通情况，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曾上奏朝廷：安徽省钱铺皆系现钱交易，间有出票之事，临时为取钱之据票，到即行发钱，并无注写外兑字样及辗转磨兑之事；钱票与银价涨落也并无碍得。^{[9]140}可见当时票据稀少，功能也十分有限。

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后，皖江区域加强了与省外市场的联系，内部也形成以芜湖为中心的金融圈，带动不同层级城镇钱业的整体发展。钱庄是金融市场主体，透支信贷、票据汇兑、异地折账等成为钱庄主要的业务方式。据芜湖海关资料报告，早在1891年，芜湖12家钱庄收支总额达5000万海关两，而票据是主要金融工具，高达4000万海关两，占据收支总额80%。在票据之中，8/10服务于省际贸易，2/10服务省内贸易。^{[1]第152册，266}在省际贸易中，近代以来，芜湖与上海、汉口、镇江、南京逐渐建立了直接内汇关系，其中与上海申汇最为紧密。在省内市场，芜湖是皖江区域贸易、金融中心，票据同样因为携带方便和流通成本低廉，实际上取代白银成为最主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工具。

现代银行出现以后，发行纸币更是银行扩充业务手段之一，近代安徽从1909年大清银行在芜湖设立分行，直到1935年南

⁴ ①《六安生银及银铜各币流通状况调查表(1917年10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67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

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以前，众多国家银行、商业银行、地方银行发行纸币，因为印制方便、易于识别、流通便捷、可以自由兑换，纸币逐渐取代钱业庄票成为最主要流通货币。

此外，除了以上各种形式的货币之外，债券也是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工具之一，近代皖省经济落后、战事不断，政府屡次发行公债和库券来延缓财政压力，也是金融市场紊乱的表现形式。如1910年，安徽为了筹措款项上解朝廷编练新军和崇陵工程经费，第一次发行公债120万两库平银^⑤，其后发行债券成为一种常态。1918年以后，北洋政府更是每年都有新债券的发行，至1926年，除去经常举办的米业公债外，据可稽数据统计，共发行债券至少615万元。^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同样如此，例如皖省1930年936万元的库收款项中，各类债券收入约占75万元；[10]1081934年皖省库收1237万元，其中债券收入更是高达232万元。^{[10]194}

二、金融紊乱对民生、经济的影响

综上可知，各种货币，特别是钱庄庄票、银行纸币的流通，极大地便利于商品贸易。但是皖江区域的币制异常混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因此如何统一国内流通货币，成为近代中国币制主要问题之一。^[11]币制混乱，导致私铸货币成风，劣币驱逐良币盛行，显然加剧普通百姓生活困苦程度。晚清时期，为了追逐铸造余利，各省滥铸铜元，铜元不断贬值。农民被迫缴纳额外的田赋负担，因为地方官府往往打折甚至拒收铜元。官府常以提高银钱兑换率的方式来转嫁损失，1907年潜山县令将银两与制钱兑换率，从1901年的1:2350提高到1:2850，并声明不能用铜元支付；^[7]甚至试图直接将田赋改为征银，1909年11月，安徽巡抚朱家宝奏请朝廷，从宣统二年冬漕起，将皖省丁漕加捐按钱百文合银六分征收，只是受到皖籍京官反对，最终失败。^⑦铜元长期贬值，造成零售物价上升，从而也增加穷人的生活成本，加剧社会动荡。据1912-1921年芜湖海关十年报告记述，在皖省银钱市场，因为铜元发行过多，以铜元计价的日常必需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毫无疑问这种增长的部分原因是铜币购买力的下降。”^{[1]第156册，356}1922年，铜元继续贬值到1银元可兑换175枚“当十”铜元，使得芜湖黄包车夫生活莫不大受影响，各车行也因铜元日贱，而所认之警捐皆以洋码计算，亏折甚巨，乃稟请警厅增加车租，以资弥补，而黄包车夫因百物昂贵，每日所得不能糊口，故对于加租表示强烈反对。^⑧1926年5月，同样因为铜元日落，警察厅加捐，各车行主加租，芜湖人力车夫再次罢工。^⑨

正是因为设厂铸币成为生财之道，近代以来安徽的造币厂和官钱局不仅是官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官吏攫取私利的账房。清末文人吴趼人在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描述了官员贿赂上司、垄断安徽银元局的情境^{[12]414-419}；在现实中，皖省官钱局总理吴虎臣是同康钱庄股东，并私设分局，假工济私^⑩，以致官钱局实为同康钱庄分铺。^⑪1919年安徽造币厂恢复，倪嗣冲委吴藩任厂长，吴一面恃倪氏益丰钱庄包揽推销；一面聘用同乡工匠铸造劣币，中饱私囊，并携款潜逃。^⑫1923年张文生督皖，立即任命原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江朝宗之子江泽春接长造币厂，铸造轻质铜元，以邻为壑，倾销市场，造成通货膨胀，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皖省各业工伙相继罢工，省内安庆、芜湖商会，省外上海、山东、广州各地商会，致电各地官府、中央，要求皖省停铸；但是由于皖省军署、省署、新安武军均恃造币厂为开支、饷源所依，皖省省长、督军皆不认可

⁵ ①安徽省财政厅编：《安徽财政史料选编》（第3卷），1990年内部版，第552-554页。

⁶ ②南京图书馆藏：《安徽财政》（第3册），出版情况不明，1933年版，第236-250页。

⁷ ③《紧要新闻：皖省丁漕加捐仍改银征钱》，《申报》1910年3月31日，第10版。

⁸ ④《芜湖黄包车夫罢工风潮》，《申报》1922年3月25日，第10版。

⁹ ⑤《芜湖人力车夫罢工》，《申报》1926年5月10日，第9版。

¹⁰ ⑥《皖省官钱局之弊端》，《申报》1909年7月6日，第11版。

¹¹ ⑦《皖省官钱局之名实》，《申报》1909年6月14日，第12版。

¹² ⑧《皖省造币厂之内幕》，《申报》1921年10月30日，第10版。

停铸。^⑬安庆造币厂继续倾销轻质铜元，受到各方指责，为当时全国货币乱象之典型。

币制混乱，除了影响民生之外，也会助长经济波动，因为钱业通过操纵洋厘，汇兑取整抹零，收取汇费、折扣等方式，获取各种利润，但自身资本不足，潜伏着信用风险。为了管理金融市场，芜湖于 1875 年成立钱业公会，安庆于 1928 年组织钱业公会。公会成为金融市场的管理机构，行市条规、洋厘牌价，皆出于此。钱业公会成立，反衬出金融市场竞争无序、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急需改变，但是钱业公会无法承担起类似中央银行的作用，无法采取统一的货币政策。

除钱庄之外，金融市场上投机利润和商品贸易需求，也刺激皖省现代银行的发展。从清末大清银行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四行”，众多国家银行、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地方银行，在芜湖、安庆，设立分支行，在内地商业中心城镇设立网点，试图构建系统金融网络。当然，传统钱庄、现代银行的设立，有利于货币宽松，刺激经济繁荣，但是蕴含着金融泡沫风险。特别在近代金融市场不健全的环境下，钱庄注重从货币汇兑、商业信贷中投机获利，银行注重对政府信贷投放，这种业务的偏重会加剧经济波动。

钱庄与银行相比，具有贷款手续简便、贷款数目不拘、甚至凭借户折客户即可透支款项等优势，长期控制金融市场；^⑭但是钱庄以独资或合伙形式为主，实力终究有限，依靠信用放款开展业务，造成钱业抗拒金融风险能力严重不足。有外国学者就敏锐指出，钱庄因无限制贷放而难以收回债款，因无限制发钞而终致受到挤兑的威胁，构成钱庄的致命伤。^[13]译序，14 页近代芜湖，除承馥、西合泰、恒茂等少数大钱庄以外，中小钱庄数量起落极大。钱业中存在着严重投机风险，仅仅依靠跑街往往对客户信贷能力无法作出准确预判。如 1930 年芜湖永华纱号投机获利，几乎全部钱庄立即主动提供信贷，后因上海联号——天华纱号投机失败，永华纱号倒闭，钱庄信贷资金套牢，芜湖钱业受累甚深。^⑮

近代银行与钱庄相比，资本实力雄厚，但是为政府提供信贷资金是其主要业务。近代皖省财政入不敷出，主要依赖向上海、芜湖金融机构借款运转。例如 1914—1922 年间，安徽财政厅每年均向中国、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借款总额达 1263 万元。这些借款或者没有担保品，或者以收入不稳定和用途极多的丁漕作为担保^⑯，缺乏偿还能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皖省曾对于北洋政府时期安徽省政府旧欠中、交两行的本息，进行过统计，截止 1930 年 6 月止，计欠本息达 550 余万元。1931—1933 年，皖省继续向上海、芜湖等地银行借款总计 154 万元，这些借款以中央政府明令废除的各类厘金性质的附加税为担保。^⑰由于担保品收入不稳定，数量有限，实际上借款很难到期偿还，因此北洋、南京国民政府期间，皖省政府借助发行债券来弥补财政赤字，除了直接销售外，主要依靠芜湖、上海金融市场，由该两地银行代销或承购。银行代销、承购债券可以获取暴利，但是承担高额风险，因为官府发行债券，一般名义上虽有还本付息基金的指定，但是与直接借款一样，到期并无偿还着落，乃发行新债券兑换旧债券，寅吃卯粮。^[14]¹⁵⁴如 1930 年 5 月 2 日，皖省政府公布施行《整理暨兑还本省旧政府时发行各年金库证券并各项公债票办法》，对未经收回的 106 万余元各年度债券进行整理，以发行 1930 年新债兑换旧债，而新债以木厘项下每月拨出 4000 元作为基金抽签偿还。^⑱实际上仍然是寅吃卯粮，偿还遥遥无期。

按照现代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发行债券是政府财政政策的一种有效手段，能起到积极的调控作用；但是近代皖省恶劣的政治生态，反而加剧了债券市场乱象。如据学者统计，1912—1927 年，皖省军事首长更替 13 人次；1912—1937 年，行政首长更替 28 人次；1912—1927 年，财政厅长更替 18 人次；1927—1937 年，财政厅长更替 13 人次。^[15]⁶⁴⁶⁻⁶⁴⁸军阀争霸，金融为王，甚至革命党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窠臼；皖江区域的安庆为安徽省会所在地，芜湖为最重要金融码头，自然是债券流通重灾区。例如，1913

¹³ ①《皖省铜元之流毒市面大受影响》，《申报》1922 年 3 月 1 日，第 10 版。

¹⁴ ②《我国银行与市面之关系不及钱庄密切之缘由》，《中外经济周刊》1925 年第 150 期，第 1 页。

¹⁵ ③《永华棉纱号倒闭经过》，《工商日报（芜湖）》1930 年 9 月 19 日，第 6 版。

¹⁶ ④安徽省财政厅编：《安徽财政史料选编》（第 3 卷），1990 年内部版，第 518—521 页。

¹⁷ ⑤南京图书馆藏：《安徽财政》（第 3 册），出版情况不明，1933 年版，第 304、120 页。

¹⁸ ⑥安徽省财政厅编：《安徽财政史料选编》（第 4 卷），1990 年内部版，第 599 页。

年皖省革命军政府因财政困乏滥发纸币、债券，引发金融恐慌，遭到芜湖商人控诉。^{①9}至于大小军阀，截留税款、劫掠城镇、滥发军票、就地筹饷更是近代皖省政治常态。

这些债券主要用于军政开支，很少用于建设事业，几无盈利、偿还能力可言，为了筹集资金，甚至不愿承担偿还之责，百姓深受其苦。例如1928年9月，商人陈振华在芜湖海关认购280元公债，发给临时收据。1934年10月，陈要求兑取正式债票，芜湖海关与南京财政部相互推脱，不予兑换。1929年铜陵县强行摊派皖省库券，县民黄畅之等人摊购8000余元，由县府发给临时印收，至1937年尚未换得正式库券，而因水旱灾害频发，临时印收也多有遗失，农民只能承担损失。^{②20}可见债券发行不仅加剧金融市场混乱，债券摊派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前述铜元贬值一样，是对百姓的一种变相洗劫，从而约束农家资金的积累。

此外，芜湖作为皖江区域的中心城市，但在全国金融市场体系中地位不高，近代皖省经济剩余主要投资省外，也不利于经济稳定。如据海关资料统计，1900-1933年芜湖海关金银出超高达40840311海关两。^{[16]266}皖省资本大量外流，本地金融资本严重不足，芜湖、安庆银钱业大多为外籍资本，依赖外埠资金挹注。如芜湖钱庄依靠在上海“润昌栈”驻扎申庄庄客，接受上海银行、钱庄放款，年终庄务结束才能离沪，新年元宵前后即须到沪接洽开户。^{[17]183}一旦上海等埠放账减少、催款急如星火，芜湖就会发生金融危机。例如1920年，就因驻沪庄客虞秀峰投机失败，申庄限制对芜放款，导致金融紧缩，市场枯竭。^{③21}1926年9月，因北伐战争影响，上海紧缩放款、加紧催款，芜湖银根吃紧。^{④22}1927年“宁汉分流”时期，汉口的中国、交通两行滥发钞票，但停止兑现；民众纷纷转向芜湖中、交两行挤兑，造成现金告罄，市面恐慌。^{⑤23}1931年长江大水，芜湖钱业损失惨重，加以镇江、上海催款，金融市场濒临崩溃。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上海、镇江相继闭市，芜湖金融枯竭；5月，上海、镇江先后开市，芜湖金融才随之宽松，洋厘上涨。^{⑥24}芜湖金融市场这种频繁波动特征，自然约束了贸易、经济持续发展。

三、金融制度对皖江区域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

近代皖江区域是皖省经济最为发达地区，但是现代工业依然落后。据20世纪30年代刘大钧的权威统计，皖江区域三座重要城镇——芜湖、安庆、大通的现代工厂（不包括电灯厂）资本总额，仅有182万元。^{[18]135-145}传统手工业也不甚发达。农业、商业无疑是经济的主体门类。仅举芜湖海关进出口贸易（埠际、国际贸易）额为例，据笔者根据旧海关资料统计，1877-1931年价值就高达1192270810海关两，年均可达2208万海关两，可见远非现代工业规模相比。皖江区域向以稻米种植为主，随着1877年芜湖口岸的开放、1882年李鸿章奏请将镇江米市迁往芜湖的政策倾斜，稻米日益成为最重要的商品，芜湖长期是全国轮运出口稻米数量最多的口岸，^[19]稻米生产、贸易成为皖江区域的支柱产业，并决定着经济整体规模。稻米生产和贸易蕴含着巨大波动，主要原因受到自然气候、市场供需、粮食政策、赋税负担、洋米竞争等等因素影响。由于缺乏统计数据，我们无法对稻米产量波动作量化分析，但海关数据资料显示，芜湖口岸贸易在长江流域口岸群中呈现出波动幅度最大的特征，^{⑦25}即能反映出皖江区域经济波动的事实。

当然这种波动除了以上原因影响之外，也与货币市场、票据市场构成的金融市场紊乱关系密切。近代中国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造成货币流通混乱、金融主体繁杂；从各地官方的官钱局、铜元或银元局、造币厂，私人票号、钱庄，

¹⁹ ①《皖省金融竭蹶之一斑》，《申报》1913年11月14日，第3版。

²⁰ ②《财政部关于各债库券代换印收事项与芜湖关监督、安徽建设厅等来往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三（六）—09275。

²¹ ③《芜湖金融界之今昔观》，《申报》1922年7月21日，第4版。

²² ④《金融界已现恐慌之象》，《工商日报（芜湖）》1926年9月4日，第4版。

²³ ⑤《金融发生恐慌之呼吁》，《工商日报（芜湖）》1927年4月24日，第5版。

²⁴ ⑥《镇江钱业开市》，《工商日报（芜湖）》1932年5月3日，第6版。

²⁵ ⑦笔者根据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的《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0-98页），对长江流域各口岸贸易价值波动图/表的比较，得出这一结论。

以及公私银行、政府机构、货币伪造商等等，均是金融市场主体，他们铸造、发行各种制钱、铜元、银两、银元、纸币、庄票、债券等等，构成种类繁多的货币、票据。这种情况虽然有时也有利于货币宽松环境的营造，但是追逐余利是其重要的出发点，从而加剧货币、票据市场紊乱。

在这些诸多的金融主体中，其中以钱庄与商品贸易关系最为直接密切。有研究者就指出，近代中国“凡百行业，资本无多，平时调转，全赖信用贷款，以资挹注，如丝、茶、米、麦、杂粮、渔盐之类，必须先济以款，而后始能获致货物”^{[20]162}，信用贷款业务主要由钱庄承担。例如就皖江区域芜湖米市而言，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帮米号坐地采购稻米，每年所需资金庞大，主要依靠芜湖钱业对省内外资金的居中调度，通过现洋调拨、尤其是申票汇兑，来平衡金融用款的季节性差异。^[21]因而钱业市场稳定对于皖江区域商业贸易开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皖江区域处于内陆，投资环境欠佳，也是淮军军功地主集团的来源地，他们占据的农业经济剩余，主要投往沿海通商大埠，因而皖江区域钱业资本主要依赖上海、镇江等外埠接济，自然深受域外因素影响。同时芜湖作为皖江区域金融中心，钱业市场始终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因素，因为除了为商品贸易正常融资之外，由于各种货币竞相流通，中国内汇市场犹如外汇市场，自然刺激钱庄热衷于投机偏好，以及自身资本不足、过度依赖信用放款等，造成钱庄时开时闭，银根时松时紧，从而加剧商业贸易波动。

我们再来分析金融与农业生产之间关系。耕地、劳动力、资本是农业生产必需的三大资源要素，在经历十数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后，安徽人口和耕地面积都发生显著波动，耕地面积由1812年41436875亩^{[22]380}重新恢复到1933年39510014亩^{①26}，人口由1812年34165056人重新恢复到1933年22093000人^{[23]11、42}。根据这种数据的变化，完全可以推算出皖省人均耕地面积有着显著增长，人地矛盾相对宽松，因而刺激农家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持续增长。在三种资源要素中，资本投资因此就显得尤为迫切。自近代通商口岸体系建立、国内外粮食市场整合程度加深，稻米成为皖江区域最重要的贸易商品，深受市场波动影响。因此，政府实行的赋税政策、提供的农村水利公共产品等等，影响着农家资本的积累；政府是否承担起维护稻米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稳定和有序等职责，也会影响着农家资本积累、农业经济增长。在近代军阀混战不已的政治生态下，政府不能解决国内粮食自由流通、不能解决洋米倾销竞争等问题，也不能推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着严重的缺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依靠增加各种赋税，滥发货币、债券等手段，造成和加剧经济波动和金融市场紊乱。在这种政府缺位又错位的背景下，钱庄、银行等城市金融资本也越趋集中于大城市，主要为商品贸易融资，投机偏好是其天性，管理与农村经济几乎绝缘。农村资本也涌入城市，农家借贷依然依靠亲友之间的传统借贷关系。这种失衡的金融市场，自然无法发挥货币、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平复经济频繁波动，维护皖江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四、结语

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关于经济变迁趋势呈现为沉沦，还是发展，中外学术界存在着激烈争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国内学者尝试对经济增长趋势中波动现象进行探索性研究，^{②27}因为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中，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就一定存在着经济波动现象。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分工、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人类社会阶段，经济波动是其显著特征。马克思最早从经济波动角度来分析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③28}近代中国在国际市场冲击下，资本主义经济有着一定的发展，同样存在显著的波动现象。皖江区域经济作为近代中国经济组成部分，我们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存在着这种现象。经济波动又是综合因素使然，诸如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迁、金融、消费、投资等都可以成为影响因素，而且相互作用。本文侧重于从金融角度来分析皖江区域经济波动，阐明两者之间关系。旨在说明，维持宏观经济持续发展是现代政府担负的宏观目标之一，因此需要政府发挥金融市场的积极作用，来平复波动对经济的伤害。在近代皖江区域，政府金融管理缺失与错位，金融市场自身落后及其对通商大埠的依附，是经济波动的金融方面影响因素。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是区域经济发展至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²⁶ ①安徽省统计年鉴委员会编：《安徽统计年鉴》，1934年内部版，第43页。

²⁷ ②参见丁建玮：《中国近代经济生活中的周期波动》，1988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玉茹：《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中长期周期波动》，《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卷第2期。

²⁸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6-587页。

参考文献:

-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 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 [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1.
- [2] 汪昌桥. 对清末安徽铜元几个问题的探讨[J]. 钱币文论特辑, 2006(2):165-171.
- [3] 江苏省钱币研究会. 中国铜元资料选编[M]. 南京: 江苏省钱币研究会, 1989.
- [4] 林满红. 银钱: 19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M], 詹庆华, 林满红,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5] 魏建猷. 中国近代货币史[M]. 合肥: 黄山书社, 1986.
- [6] 安徽通志馆. 安徽通志稿财政考[M]. 安庆: 安徽通志馆, 1934.
- [7] 何汉威. 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93(3):389-494.
- [8] 寇尚民. 安徽安庆造币厂所造银币探究[J]. 收藏, 2012(17):94-97.
- [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10] 贾德怀. 民国财政简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7.
- [11] 崔晓岑. 四十年来之中国币制问题[J]. 经济学季刊, 1936(4):38-62.
- [12] 吴趼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6 年.
- [13] 罗威廉. 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M]. 江溶, 鲁西奇,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14] 孙怀仁. 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M]. 上海: 生活书店, 1937.
- [15] 谢国兴. 中国区域现代化研究安徽省[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
- [16]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 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M]. 上海: 商印馆. 务印书馆, 1935.
- [17]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上海钱庄史料[G]. 上, 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 [18] 刘大钧. 中国工业调查报告: 下册[M]. 上海: 经济 7 统计研究所, 1937.
- [19] 方前移. 近代口岸市场米粮贸易波动研究——基于] 海关资料的分析[J]. 中国农史, 2017(1):81-93.
- [20] 杨荫溥. 中国金融研究[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 [21] 方前移. 浅析钱业与商品贸易互动关系——以芜湖、中转市场为例[J]. 中国农史, 2012(3):45-53.
- [22]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3] 安徽通志馆. 安徽通志稿民政考[M]. 安庆:安徽通